

走近胡风及其“七月派”

□周燕芬

10多年前,曾一次又一次去胡风家里,又一次一次面对那尊倔强的青铜雕像,和梅志及其子女,和绿原、牛汉、贾植芳、徐放等一起回忆往事,内心激荡的情感总是难以平息。

无论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还是一个文学社团,“七月派”这个以胡风为核心的文人团体贡献给文学史上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成就,与之伴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内容及其深远影响,时至今日仍旧绵延不断的人事争议和学术讨论,都在证明它所提供的学术问题的重大性与敏感性,有些甚至可以引申出对当代和未来某些前沿问题的思考,如此丰富复杂的学术蕴藏,决定着它不同一般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相应用说,目前对它的重视程度和已有的研究可能还远远不够。

档案的未完全公布和史料的人为限制,使得倚重史料的实证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课题很难做到准确和完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入门冒险的和遗憾的学问。研究中史料的征引和辨析,好像永无止境,更令人忐忑不安的是,有可能今天成果面世,明天就要面临最新公布档案或史料考据的检验,这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尴尬所在,或许也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魅力所在。真相和真理,总是在不可知的前方招引着,漫漫长途,苦苦求证,这是研究者的职责,也是研究者的宿命。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七月派”,符合通常意义上我们对文学流派的概念界定。有期刊《七月》和《希望》为创作和理论阵地,有享有相当威望的盟主胡风及其主导性理论思想,七月派应该是比较规范严整的文学流派了。但七月派又因其涉及作家多,持续时间长,内部变化大,创作构成广而形成一种“集中又开放”的“泛流派”特征。我所理解和研究的七月派,是一个包含了小说、诗歌和理论批评的全方位展开的大流派,这个大流派可以分解为几个板块,如“七月诗派”和“七月派小说”,各成独立体系,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现实主义理论也独树一帜,是20世纪现实主义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一脉。另一方面,七月派的诗歌、小说、理论之间,又有着内在的深刻联系,相同的思想、精神、心理取向与相同的审美追求,铸造出七月派整体系统的群体形象。

七月派这种“泛”的特征,正说明七月派巨大的包容量和影响力,是文学流派高质量的一个标志。但毕竟,流派的“泛”不能取代流派质的规定性,否则流派也就不成其为流派。七月派在结构形态上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整体上表现为流派成员的多样性、流动变化性与流派特色的集中性、稳定性的统一,具体地,七月派成员之间在思想观念、审美理想、叙述方式等方面也保持着多样性的统一。流派是个性化的产物,流派当然不排斥个性,七月派是众多个性的气脉相通,正是在个性与共性的对立统一关系方面,七月派为文学流派能够发展和得以成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经验。

首先看流派的盟主胡风,他是七月派的一位诗人,同时是一位具有理论创造精神的现代文论家。“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主体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核心,也是胡风文艺思想的独特性和深刻性所在。胡风文艺思想是在多元思想资源的融合中形成的,包括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对苏联文学思想的吸收,西方现代主义对其的潜性影响,对鲁迅文艺思想的继承以及文艺实践的印证几个方面。胡风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特定时代和社会文化环境的

(上接5版)

《大堰河》虽似讲述“我”的保姆大堰河的故事,但其实是讲“我”的故事。“我”在狱中凤凰涅槃,通过大堰河确立了新的身份,也确立了新的阶级认同。大堰河是“永恒之女神”,“引领我上升”;大堰河是“我”的母亲,“我”由此而新生。彼时尚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艾青的这首诗却与之异曲同工,以工农为父,甚至以工农为母。

《大堰河》涉及几个人:“我”,地主的儿子;大堰河,“我”的保姆;“我”的生母,地主;大堰河的儿子们,被压迫的工农。大堰河是被剥削、被压迫的贫农,为了生计,她不得不艰辛地劳动。诗歌写道:“大堰河,为了生活,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她就开始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她含着笑,洗着我们的衣服……她含着笑,背了团箕到广场上去晒好那些大豆和小麦。”“我”虽不是大堰河的亲生儿子,她虽然只是“我”的乳母,但“我”却以她为母亲。诗歌写道:“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儿是在狱里,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呈给你的黄土上紫色的灵魂……呈给爱我如爱她自己的儿子般的大堰河。大堰河,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长大了的,你的儿子,我敬你,爱你!”“我”似乎在向大堰河献祭,而祭品就是这首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我”虽与大堰河的儿子们没有血缘关系,但也认为其为兄弟,诗歌写道,“当我经了长长的漂泊回到故土时,在山腰里,田野上,兄弟们碰见时,是比六七年前更要亲密!”“我”虽是父母的亲生儿子,可是一朝面对他们,却感到诸多不适,诗歌写道,“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总之,诗歌写道,艾青背叛了他的阶级,他这个“地主的儿子”,竟以贫农大堰河为母亲,以大堰河的儿子们为兄弟,在大堰河家中,“我”有归属感,在生身父母家中,“我”则只是客居。

艾青有政治抱负,他以诗歌革命。艾青革命的入手处是家庭,他要改变家庭伦理。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也要破除家庭,他与晚清以降诸贤达出发点相近,因为中国内忧外患,破除家庭才能万众一心,共同抵御外患,建成国家。艾青的特殊性在于,他所征引的资源是左翼理论。在《大堰河》中,艾青出身于地主,此不可改变,但他二度抉择,抛却自己的阶级立场,以贫农为母亲。大堰河一方面是实写,她是艾青的保姆;也具有象征意义,她是贫农的化身。在《大堰河》中,阶级的感情胜过了血缘亲情。

艾青这首诗《大堰河——我的保姆》一方面写实,他小时候因被算命先生说为克父母,故从小即被寄养在乳母家中,稍大才被接回生身父母之家。艾青家境富裕,有地,有店面,可以称为地主之家吧。其次,这首诗并不完全写实,情感有虚构、夸张处。按诸常情,艾青在大堰河家长大,对其肯定充满了感情。儿童对母乳眷恋,长大之后也敬重她,给予回报,此人之常情。当艾青重回父母之家,一时难以适应,有作客之感,亦是正常之事,但不适之感必不会持续很久。其后,艾青的父母养育了他,供其读书、留学,千方百计营救他,岂能没有感情?艾青身在狱中,前途渺茫,故将悲愤之情夸大,将一时情绪写入诗歌。今日读此诗,当知艾青写作背景,如此方能深入理解这首诗,不可将其普遍化。

1941年8月,艾青写了一首长诗《我的父亲》。彼时艾青已赴延安,此为其表明心迹之诗也。这首诗一方面描写了父亲的一生,也写了“我”

的影响和限定,但秉持相对开放多元的影响视野和吸收姿态,并坚持与文坛不良倾向作斗争,使得胡风在执守现实主义文学立场的同时,进而在发展中求得思想的突破,并表现出超越性的现代意识。胡风和群体成员思想理论的交相辉映,构成七月派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七月派的创作成就和艺术高度得益于他们的理论支撑。以路翎为例,胡风的文艺思想,他是当作其创作的自觉理论指导的。不可设想,没有胡风的精心栽培,路翎会成长为一流的小说家,会创作出《财主底儿女们》。路翎是一个天才,但他的天才潜质倘若不被胡风发现和挖掘,不和七月派这样的流派氛围相遇,何时才会展露他的天才光华?胡风曾鼓励路翎:“只要努力,我敢预约给你一个伟大的前途。”这不是虚空的预约,而是思想的撞击,心灵的融合。路翎所表现出的文学感觉印证了胡风的理论,胡风一点一点地帮助他,拉扯他,像母亲带孩子一样。所以说,以一种独创的有深度的思想理论凝结起来的文学流派,一定是更为稳定成熟的、更具生命力的,它大大提升着流派群体的艺术高度,使流派具备了产生经典作家和作品的更大可能性。

再看诗人艾青,艾青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中最杰出的诗人之一,是具有世界声望的诗人。艾青是否真正属于七月派,评论界一直存有争议。如果认定,以《七月》为中心动态而开放的作家群体构成及其文学活动是七月派的前期,所谓“泛流派”也是流派的一种甚至是更为理想的一种,那么,艾青是否属于七月派,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艾青以他一生几个时期的诗歌成就,形成了现代新诗史上的一个高峰,相较于而言,艾青最优秀最有影响的作品,最早奠定他在新诗史上地位的作品,应该是抗战前前后到20世纪40年代这几十年的诗歌创作,他发表在《七月》杂志上的“太阳”诗组和“北方”诗组,毫无疑问属于他一生作品的经典之列。另一方面,艾青以他独具魅力的诗作影响一大批青年走上诗坛,这其中绝大部分人成为七月诗派的中坚力量。他们追随中国自由诗战斗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们“始终欣然承认,他们大多数人是在艾青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绿原)不排除初期外在的模仿和因袭,但根本上,他们从艾青那里学到了“诗的独创性”,这就为七月诗派整体奠定了一个艺术的高起点和高品质。如果说胡风更多地起到了人格影响和理论指导的作用,起到了凝聚一个流派的精神和组织形式的作用,那么,诗歌艺术的熏染和吸引,则更多来自艾青。胡风和艾青,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催发了七月派的产生,推动了七月派的发展和成熟。不同的是,艾青没有胡风那样的自觉的领袖意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领唱”作用的肯定。艾青“既是高峰,就自有他所从属的山系”(牛汉),艾青以及田间、路翎和七月派的关系,证明文学流派中完全可能产生一流的作家和诗人,阿垅、东平等其他七月派作家,同样具备了成为文学大家的潜质,并已经有了出色的创作表现,限制他们的显然不是流派自身,是战争和政治运动人为地中断了他们的艺术生命。

七月派后期流派意识逐渐自觉起来,在文学思想和艺术风格上加强了共同性的追求,频繁的文艺论争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对其他流派或异己主张的排斥,流派集中、自守的特点明显起来。不可否认宗派情绪的存在对流派的负面影响,但从根本上破坏流派生存环境的,还是政治强势这股更大的非文学的力量。从

20世纪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势看,“潮流化”别无选择,“政治化”不可避免,但能够兼顾时代的特殊要求,又竭力保全更为深厚复杂的文学精神者,当是更可取和更难能可贵的。七月派“听命于时代”,又执著于个人;其创作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又坚守艺术阵地;其风格既是高昂雄宏的,又是悲郁苍凉的。七月派融铸方家于一身,具有整合时代各种文学风尚的端相,这就注定了其艺术面貌的丰富复杂,这也是一个大流派气象与风度的体现。

新世纪以来,社团老人辞世的消息总是不期而至,梅志、胡征、贾植芳、彭燕郊、耿庸、绿原、何满子……大概还有我不知道的其他追随胡风的世纪老人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离去,一次又一次触碰着中国百年历史的痛楚记忆,同时也提示着,伴随这个社团生死动荡的那段沉重历史也与我们渐行渐远了。此时再回头走入老人们的如烟往事,心情难免为感伤痛楚甚至灰败虚空所笼罩。但是人生的信念和坚持的力量也常常来自于他们,记着梅志对胡风临终时的承诺:“我会为你说清的。”说清历史,当然也是我们后辈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记得几次拜访绿原,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有力的绿原式的诘问:“胡风为什么要办刊物?”“我们为什么要爱诗?”“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诗的人生?”这些看起来似乎并不复杂的问题,在绿原诘问式的强调和渐次深入的阐述中,汇聚成一个激情与思想的汪洋大海。胡风和绿原们战斗的文学历程,伴随着文学追求而盛衰沉浮的人生命运,经由问题的端点引发出来。我无法不被先生激情的诘问所震撼,回头故纸探问历史的时候,又无法排解压在心头的沉重和困惑,这种不稳定的情感状态,其实也说明了,我们或许还没有到真正能够说清楚那段历史、那些人和事的时候吧。

时间正在愈来愈远地拉开我们和那段历史的距离,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审视距离。历史曾经那样离奇那样荒诞地捉弄了我们,以悲剧和灾难为代价,我们是不是已经获得了清醒地审视历史的眼光,和理性地读解历史的能力了呢?

当下对胡风社团特别是“胡风集团”的研究,在更加客观更加理性地接近历史真相的努力中向前推进,争论依然存在甚至会有激烈和胶着状态,焦点往往还在史料占有和辨析问题上。研究中最深切的体会是,一旦有新的档案打开,新的史料公布,极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面临着对学术命题的重新思考。可以预见,随着现当代文学档案公布工作的进一步展开,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公开、发现和发掘,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很多实证性的研究课题将会不断地得到补充、完善和深化,甚至有根本性的变化,这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一个特点和难点。对我自己来说,目前社团史所呈现的,仅仅是这项课题进行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要尽可能地趋近于理想的研究目标,还有待于外部环境的再度宽松,研究思想的再度解放和不止一代学人的艰苦努力。而最具体的,就是历史档案的全面完整的公布,将极有可能改变目前我完成的社团史的面貌。因为,现在的研究成果中,实在留下不少史料的空白或者因史料的不信、疑虑、矛盾而带来的所谓“分寸”,所谓“留有余地”,说到底,依然是研究的一种不清楚和未完成状态。

父亲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表明了他与家庭决裂的决心。在艾青的笔下,父亲是这样的:“他显得温和而又忠厚,穿着长衫,留着辫子,胖胖的身体,红褐的肤色,眼睛圆大而前突,两耳贴在脸颊的后面,人们说这是‘福相’,所以他要‘安分守己’。满足着自己的‘八字’,过着平凡而又庸碌的日子,抽抽水烟,喝喝黄酒,躺在竹床上看《聊斋志异》,讲女妖和狐狸的故事。……但是他,我的父亲,却从‘修身’与‘格致’学习人生,做了他母亲的好儿子,他妻子的好丈夫。接受了梁启超的思想,知道‘世界进步弥有止期’。成了‘维新派’的信徒,在那穷僻的小山庄里,最初剪掉乌黑的辫子。……经常翻阅世界地图,读气象学,观测星辰,从‘天演论’知道猴子是人类的祖先;但是在祭祀的时候,却一样的假装虔诚,他心里很清楚;对于向他缴纳租税的人们,阎罗王的塑像,比达尔的学说更有用处。无力地期待‘进步’,漠然地迎接‘革命’,他知道这是‘潮流’,自己却回避冲激,站在遥远的地方观望。”由此可见,艾青的父亲颇为开通,他深受维新一代影响,有新知识,亦有颇为丰厚的产业,是乡村的绅士。但在艾青看来,父亲已不合时宜,已经过时。此诗卒章显志:“自从我知道了,在这世界上有更好的理想,我要效忠的不是我自己的家,而是那属于万人的,一个神圣的信仰。”艾青毁家纾难,抛弃了家庭,参与了救国大业。在《大堰河》中,艾青只是背叛了其阶级,而在《我的父亲》中他则正式宣告了与家庭的决裂。原因在于,“我”不仅属于家庭,而更属于信仰,“我”为了信仰,要离家出走。胡适《终身大事》中田小姐离家出走亦为信仰,其信仰是个人解放,婚姻自由;较之“五四”时期,信仰已变,艾青的信仰是共产主义。

在《大堰河——我的保姆》中,艾青除了解构家庭伦理之外,对国家亦有批判。在诗中,艾青说“我是在写着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大堰河》就是他写下的一道诅咒。艾青赴法留学,学成归来,非但得不到重用,反而因罪下狱,其悲愤可想而知。艾青对比了乳母家与生母家,描写了大堰河生活之艰辛,也描写了大堰河儿子们的处境:“第二个死在炮火的烟里,第三、第四、第五在师傅和地主的叱骂声里过着日子。”艾青就是要为大堰河们鼓与呼,为他们争权利。

1936年,茅盾约请胡风为《文学》写一篇近年诗人创作情况评论,胡风也想借此机会论述诗歌在彼时所起的作用,于是开始搜集资料。也恰在1936年,艾青选择了9首诗,自费印成诗集,名为《大堰河》。田间将这部诗集送给了胡风,胡风读后,击节赞叹,于是放弃原来计划,遂写成了那篇名文《吹芦笛的诗人》,专门介绍了艾青的诗歌创作。

胡风非常重视《大堰河——我的保姆》这一首诗,他以此为基础理解艾青,他说:“艾青是‘地主的儿子’,然而却是吃着受了‘人世生活的凌辱’和‘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的保姆的奶长大的,不但在‘生我的父母家里’感到‘忸怩不安’,而且在写着‘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胡风给予艾青非常高的评价,由此艾青的诗歌引起当时文学界的极大重视。《大堰河——我的保姆》受到重视,除了胡风的推介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30年代之后左翼思潮日益盛行,并最终于1949年成为中国的主导思想,因此与此相关的文学作品大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

“七月派”是团结在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等杂志周围的一批左翼进步作家,他们共同的精神领袖是鲁迅。随着鲁迅博物馆馆藏的“胡风文库”中收藏的胡风主编过的期刊的影印出版,不仅可以看到胡风主编过的6种期刊的全貌,而且也可以看出《七月》和《希望》杂志所体现出的鲁迅精神的影响。

《七月》周刊

《七月》周刊创刊于1937年9月11日,刊名之所以取名为“七月”,是为了纪念七月抗战的爆发,“欢迎这个全面抗战的发动期到来”,另外,“七月”两字是采用鲁迅的手迹,是为了表达对鲁迅的纪念。可以说,《七月》杂志由此把宣传抗日战争与纪念鲁迅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不仅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弘扬鲁迅精神,而且也以鲁迅精神来指导抗战宣传工作。

《七月》周刊只出版了三期就停刊。这三期所刊登的文章作者大都是受到鲁迅影响的进步作家,如胡风、萧军、萧红、曹白、端木蕻良、艾青、刘白羽、丽尼等,另外,还刊登了一些美术作品,如李桦创作的木刻《被枷锁着的中国怒吼了》和《旗手》、野夫创作的木刻《保卫我们的城池》、陈烟桥创作的漫画《我么也要去杀日本强盗,给我们枪啊!》。总的来说,这些文章、诗歌和美术作品的主题都是宣传抗战的。值得注意的是,《七月》周刊第二期刊登了胡风的诗歌《给怯懦者》,这首诗描述了历史上的眉间尺复仇的故事,呼吁在抗战时期怯懦的人们拿起武器反抗敌人。作者特意在诗歌后面注明“眉间尺和黑色人底故事被写在故事新编底铸剑里”,由此,也可以说胡风的这首诗歌是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对鲁迅的小说《铸剑》中故事情节的改编,用鲁迅在小说《铸剑》中所表达的复仇精神来宣传抗战。

此外,《七月》周刊第三期刊登了鲁迅之子周海婴手写的儿歌《打日本》。周海婴当时只有8岁,杂志在刊登这首儿歌时采用了周海婴的稚拙的手迹,更形象地表达出作为鲁迅之子的周海婴反抗日寇的精神,很好地起到了宣传抗战的作用。

《七月》半月刊

因为战事的发展,胡风也把《七月》周刊停刊,并从上海撤到汉口。他到汉口后,本来想创办一个新的杂志《战火文艺》,但是因为手续不全而未能成功,于是就重新恢复了《七月》杂志,并改为半月刊。

《七月》半月刊于1937年10月16日在汉口出版,首期刊除了重新刊登《七月》周刊所发表过的一些文章外,还设立了“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辑”,在杂志封面刊登了《鲁迅先生在休息的时候》和《敌人炮火下的墓地》两张照片,另外还有惊百创作的木刻《鲁迅先生的一生》、聂绀弩的文章《人与鲁迅》、彭柏山的文章《“活的”依旧在斗争》、萧军的文章《周年祭》、萧红的文章《在东京》、端木蕻良的文章《哀鲁迅先生一年》、胡风的文章《即使尸骨被炸成灰烬》等。

除此之外,胡风在发刊辞《愿和读者一同成长》中提出了抗战中“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在今天,抗日的民族战争已经在走向全面展开的局势。如果这个战争不能深刻地向前发展,如果这个战争最后胜利不能不从抖去阻害民族活力的死的渣滓启发蕴藏在民众里面的伟大力量而得到,那么,这个战争就不能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它对于意识战线所提出任务也是不小的。”胡风的这一观点不仅是对民众“精神奴役创伤”的一种表述,同时也是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深刻地影响到了“七月派”作家的一些小说创作。

另外,《七月》半月刊也多次刊登关于鲁迅的消息。如《七月》半月刊第一期刊登了征集木刻准备在武汉展览的启事,“一以纪念中国革命文学之父,同时也是新兴木刻艺术底首创者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一以纪念《七月》在武汉的发刊”。《七月》半月刊陆续刊登了一些征集到的木刻作品,如第一期刊登的沃渣创作的木刻《全民一致的力量》、第二期刊登的沃渣创作的木刻《饿死也不被汉奸收买》、第三期刊登的张慧创作的木刻《野火》、第四期刊登的野夫的木刻《曙光》和李桦的木刻《游击队员》、第五期刊登的李桦的木刻《被锁着的中国怒吼了》和力群的木刻《出征》等,这些进步的木刻工作者大都是受到鲁迅影响而走上木刻创作道路的,他们这一时期所创作的木刻作品大都以宣传抗战为主题,配合杂志所刊登的文章,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七月》半月刊第二期刊登了罗衣裳撰写的《记鲁迅先生周年祭》,描述了由武汉文化团体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祭大会的情况。

《七月》杂志第十六期为配合《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刊登了《鲁迅全集发刊缘起》一文,文章指出:“这是一个火炬,照耀着中国未来的伟大前途;也是一个指南,指示着我们怎样向着前途走去。在这个民族抗争的期间内,这全集的出版,将发生怎样的作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胡风为了进一步宣传《鲁迅全集》的出版意义,特地在本期的《七月社明信片》一文中指出:“本期特载《鲁迅全集发刊缘起》,这对于中国思想界文艺界是一件大事,我们相信一定能够得到读者底广大支持。”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七月》半月刊第十期刊(1938年3月1日出版)登了由大漠笔录的《毛泽东论鲁迅》一文,这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从政治的角度对鲁迅作出了高度评价,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毛泽东最后发出了号召:“我们纪念鲁迅,就是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使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毛泽东的这个讲话能在国统区的《七月》杂志首次公开发表,使国统区的广大读者可以了解到中共领导人对鲁迅的高度评价,不仅体现了胡风的勇气,而且对于推动鲁迅在抗战时期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七月》月刊

《七月》杂志在总第十八期后停刊约11个月左右,终于在1939年7月重新在重庆出版,并从第十九期起开始改为月刊。胡风在《愿和读者一同成长》刊首语中指出了出版《七月》月刊的目的是:“多少能够使进步的文艺发展,为光荣的祖国效命。”

《七月》月刊也多次刊登关于鲁迅的消息。如《七月》月刊总第二十期刊登了两个关于鲁迅的消息,其一是征集木刻的消息:“木刻家李桦、新波、建庵、赖少其在桂林筹备‘鲁迅木刻展’,征求木刻创作……以及一切有关木刻和鲁迅先生的文献”;其二是《鲁迅书简》的出版消息:“这是鲁迅夫人在征集的书信里面选印的真迹纪念本,从这里可以真切地感到,就是在日常的人事接触中,这一代巨人也随时吐露了坚贞不苟的精神”。另外,该期杂志还在《排印前小记》中预告了出版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专辑的消息:“10月快到了,我们也想有一点纪念